

## 走進古典，閱讀古代

時 間：111 年 11 月 9 日（三）10:00-12:00

地 點：國立屏東高級中學

主 講 人：林啟屏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）

主 持 人：陳國祥（國立屏東高級中學校長）

記 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打開電視機，我們時常看到談話性節目來賓滔滔不絕地講述著「古代」的種種，不論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、英雄豪傑的叱吒風雲、才子佳人的兒女情長、販夫走卒的悲歡離合等故事，試圖滿足許多人對於「古代」的浪漫想像或既有迷思。事實上，以「古代」作為研究客體，往往因古典文獻詘屈聱牙的語言文字使人望之卻步，於是「解讀古代」似乎成為少數專業人士才具備的能力，這些古典文獻最終成為許多人求學階段「熟悉的陌生人」，以及考題上蒼白的「標準答案」。惟此，人文沙龍講座邀請林啟屏教授以「走進古典，閱讀古代」為題，從跨學科的角度解構何為「古代」、解讀古典文獻的詮釋基礎，以及經典事例的解釋分析。



圖一：（前排左起）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、主講人林啟屏教授、主持人陳國祥校長與參與講座學生合影

以「古代研究」作為職志，實有著研究的興味與困境。過去林教授曾討論漢代「經典」正典化的過程，其在各種複雜的因素交互作用下，取得了「神聖性」的認可，成為具有規範性的價值標準。同時，歷史的偶發事件也可能對經典形成重大影響，當中最值得注意的當是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所載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的事件，文云：「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」李斯提出始皇所認可的焚書主張，並非是任意隨興的舉止，而是基於畏懼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等古代典籍所涵藏的諷刺、批判力量，以及當代知識分子對諸國史官紀錄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的詮釋往往具有批判性，進而產生顛覆政權的可能性。秦火焚書的影響，除了表現於典籍亡佚所產生的文本差異及文字訓解不同，也呈現知識分子對於「聖人之道」（真理）承續的斷裂，進而形成面對經典的焦慮感。林教授總結秦火焚書所帶來的「斷層」，除了在文字解讀上，也使經典詮釋者在面對真理訓解時產生異議，形成對於「信仰」的斷層。此外，基於前述二者，歷代學者各自形成理解經典的合法性，批判他者為異端，形成學者間「系譜」的斷層，進而成為「古代研究」的困境。不過，種種文獻的出土，如甲骨、青銅、竹書、帛書等，提供了學者瞭解古代的新途徑，並藉由各自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「證」果。林教授也形容自己的研究，一路走來便是墜古、綴古、醉古的過程，由投身的墜入、創發的綴合到沉浸的醉心，這是身為研究者才能感觸到的興味。

林教授認為，進入古代研究需要跨領域的知識，因此在求學階段也汲取了歷史學、考古學的知識與方法。誠如楊儒賓教授於《人文·島嶼》訪談中所說：「我一直認為要在中文系做學術的人必須具備 1.5 個專業，中文系必須要有跨領域的學問才能站在古典學的基礎上，讓別人看見。」林教授也認為參與跨領域學術社群，可藉由交流帶來不同的想像力來源，對於研究古代是有所裨益的。既然投身研究古代，首要面對的問題，便是古人與現代人有什麼不同，這便涉及人之於時間與空間的感知處境。事實上，人的「存在」(being) 及其意義，一直是歷代哲學家熱切關注的議題，人由什麼時間，出現在什麼空間，建構了什麼意義，是古代研究應需理解人的定位與開展。也就是當人的主體覺醒，確定「我」的形象產生，進而產生意義與內涵，故「古代」之於「現代」，不僅是時間上的區隔，而是人類在歷史過程中所賦予的意義與重要性。亦即「古代」不純然是自然時間序列久遠的「以前」，也是人們賦予意義而建構出的「歷史」，所強調的便是人在時空中的作為與作用。例如人們的「書寫」成為「文獻」，而在歷史時

間的淘洗下，因其具備的「普遍真理」與「普遍人性」的召喚，進而提升至「經典」的地位，對於人類文化價值產生了重要的系統性作用。

## 一、前言

### 1.2: 古代研究與跨領域

歷史學、考古學、小學……

跨領域學術社群交流經驗的重要性：想像力的來源之一

「為了回應現實關懷，楊儒賓特別關注當代的學術資源，『我一直認為要在中文系做學術的人，必須具備1.5個專業，中文系必須要有跨領域的學問，才能站在古典學的基礎上，讓別人看見。』」

▶ (〈身為儒者，不可能不介入世間：專訪楊儒賓談人格轉化與感通〉，《人文·島嶼》)

圖二：主講人林啟屏教授引用楊儒賓教授觀點，說明古代研究與跨領域的連結  
(圖片來源：講者簡報)

現象世界構成我們存在的基礎，而人類文明的起點，始自於如何瞭解世界及如何解釋此一現象世界。但面對萬象紛雜的世界，人類的知識建構僅能是侷限且單面向的，而知識的作用，充其量只能在一定的界限中窺知部分的真理，而且是個充滿挫折的認知經驗，人類文明的推展只能在不斷嘗試錯誤中匍匐前行，因為人的單面向知識有其不足處，所以跨領域的能力更彌足珍貴。然而如何面對古代與古典？林教授認為，對於證據有效性的反省及想像的作用相當重要。但「想像」並不是無由的憑空虛擬，而是基於有效證據的合理推論，並運用不同研究方法（如量化分析、現地研究、文物考古等）重建或應用邏輯，方能進入主觀與理解，形成客觀的「知識」。值得說明的是，研究固然是追求「真實」的過程，然而人的記憶、所書寫的「歷史」，事實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選擇性。林教授引述史學家王明珂先生的說法：「顯然，並不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構成我們所信賴的『歷史』，而是當前的社會事實（或社會現實）使得我們選擇某些歷史事實，或創造些對過去的想像，以某種方式來建構我們所相信的『歷史』。我們相信這樣的『歷史』，因為它與社會現實以及相關的社會權力緊密結合在一

起。說得更準確些，歷史事實造成某種政治、社會情境；在這樣的情境中，掌握權力者（個人或群體）也掌握『歷史』建構，於是他們以『歷史』來強化有利於己的社會現實情境。」<sup>1</sup>

王汎森於〈價值與事實的分離〉<sup>2</sup>一文中也談到，1920、30年代史學界產生了一些新的解釋風格，認為學術研究與道德、信仰理當分開檢視，亦即「價值」與「事實」的分離，尤其是傳統的義理價值與歷史事實之分離。這種學術風格與兩種研究方式有關：首先是將載籍文獻「對象化」，都視為是研究的「材料」，所追求的是科學知識，而非道德修養，甚至刻意擺脫道德或倫理意涵的束縛。其次是把一切研究對象「歷史化」，要求以歷史發展的態度去看待事物，認為所有文學、哲學、人物，都是時代環境的產物。一個時代有其時代的事物，且隨著時間的前進不斷地產生變化，並無所謂的天經地義、亙古不變的道理與價值。同時要把一切歷史或人事還原到其歷史脈絡中，看它的真相是什麼，卻不管它對現代有沒有意義，例如研究唐代人如何刷牙，只為還原當時生活的事實樣態，而不是要以古鑑今，來改善現代人的口腔衛生。

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，林教授也提及顧頡剛〈與錢玄同先生論史書〉所提出的「層累造成說」，顧氏認為傳統古史有三個特點：

1. 「時代愈後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」。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，到孔子時有堯舜，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，到秦有三皇，到漢以後有盤古。
2. 「時代愈後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」。如舜，在孔子時只是一個「無為而治」的聖君，到〈堯典〉就成為一個「家齊而後國治」的聖人，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。
3. 在這樣的狀況下，人們「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，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」。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，但可以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。

然而，顧氏的「疑古」精神將傳世文獻中的早期歷史，視之為編造、不可信的對象，也受到部分學者的批評，尤其是當出土文獻可證成早期歷史的真實性時，這種通盤懷疑的態度也受到挑戰。1925年，王國維提倡「二重證據法」，乃是運用考古文物與古文獻相互印證的作法，被視為是考據學與考古學的重大革新。以王氏所論為基礎，又有人發展出「三重證據法」進行改良，如饒宗頤將考古材

<sup>1</sup> 王明珂（2015）。《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：文本與表徵分析》，第一章〈事實與現實〉，頁26，臺北市：允晨文化。

<sup>2</sup> 王汎森（2003）。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，〈價值與事實的分離〉，頁377，臺北市：聯經出版公司。

料又細分為有字及無字，分別稱為考古器物及古文字資料（直接史料）；葉舒憲則是將考據學、甲骨學再加上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運用。

文獻的基本構成是語言文字，所以任何文本的理解或完成，都與語言文字的解讀和建構密不可分，而在運用此語言文字作為表達的過程中，書寫者的視野也決定了文本的走向，而敘述的視角也隱含了對於書寫對象的價值判斷。對於研究材料的語言與意義，林教授認為可以由語法結構進行判斷的分析，或由經驗中判斷真假的綜合應用。其另引述了蔡英俊教授對於「敘述」、「敘事」與「描寫」的區隔。「敘述」一詞或可用來指稱一般以「小說」作為代表的一種文類概念，也可以用來泛指包括神話、民間故事、傳奇、自傳或傳記、歷史及心理分析等以呈現「事件」或講述「故事」為主的書寫方式；「敘事」與「描寫」這兩個語詞或概念，則用以指稱包含在「敘述」活動中兩種不同的行文或書寫特質；「敘事」的重點在於強調對事件進行的刻劃，而「描寫」則強調對於人物的特質或狀態的呈現。延續蔡教授的看法，林教授也提出了對於出土文獻研究的反思，他認為先秦時人的思考習慣，是將「存在」與「價值」相結合以觀看萬事萬物的方式，也進一步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，所以當今人從事出土文獻的研究時，理當注意這個思考問題的模式。先秦思想家看待世界，並非以純粹的客觀視角，而是以「價值判斷」的眼光作為理解人事物的基礎，林教授認為：「先秦的人們敏銳地注意到客觀存在的世界，並非僅是客觀存在的姿態，其存在的自然性質，常常是遙指『規範』的價值意涵。」其書寫敘述的過程也是如此。進一步說，當書寫者展開價值判斷的視角時，其所見所寫也是成就「自我生命」的過程，乃是邁向「成人」之道的路徑。所以當研究者在處理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時，應當留心這個結合「存在」與「價值」所形成的立場與動機。